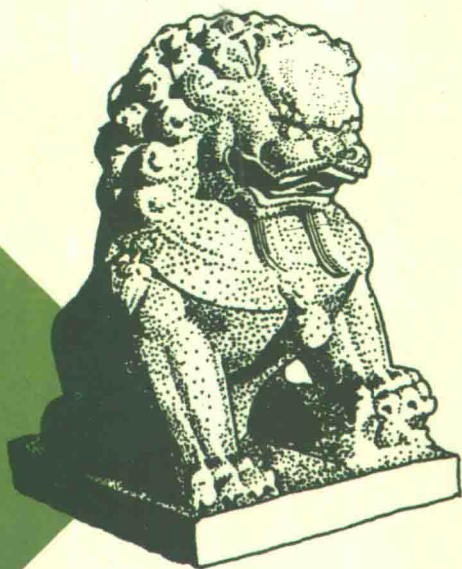




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

王继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湘军集团与 晚清湖南

王继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王继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3

ISBN 7-5004-3296-8

I. 湘… II. 王… III. ①湘军—研究—文集 ②地方史—研究—湖南省—清后期—文集 IV. K256.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0698 号

责任编辑 田 文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n.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

《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研究》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湘军集团研究》

成果之一

并得到湘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自序

湘军是晚清中国的重要历史现象，对晚清中国的影响自不待言，而对晚清湖南社会乃至现当代湖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乃至湖南人的精神仍然产生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湘人始终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湘军情结”。因此，对于湘军的研究，学术界一直非常重视，除了诸多研究论文以外，20世纪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有罗尔纲先生的《湘军兵志》和龙盛运先生的《湘军史稿》以及朱东安先生的《曾国藩传》。

我接触湘军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则作为曾国藩的后辈同乡，在从事近代史研究后，对这位在近代史上极具影响且又颇具争议的乡贤前辈和他的湘军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二则当时我在1986年的《求索》上发表了《左宗棠与曾国藩之比较》一文，对曾国藩的评价虽尽量平和，但较传统观点毕竟有所不同，于是颇有一些业内人士为之骇异，略有非议。时值我正师从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著名的历史学家林增平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于是就教于林增平先生。交谈之中，先生以为对湘军的研究，应将其视为一个集团，并改变以往仅仅视其为军事集团的研究

究思路，而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开展。这给我以很大的启发。于是在以后的研究中，我致力于从乡土文化的背景，探讨湘军的产生、发展以及这种乡土文化所赋予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特色、对湘军人物和湘军集团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的深层影响。由此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因为要探讨湘军，乃不得不研究晚清湖南社会，就这一问题，我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所幸的是，这些论文受到学术界的诸多关注。其中不少被《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情报》、《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等文献引用、评述、摘要、转载。在湖南省第四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评奖中，以《曾国藩与湘军集团研究》（系列论文）获优秀奖。1998年和1999年，我又分别以《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研究》、《湘军集团研究》名称先后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和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是一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当然，这本书稿的出版并不是这两个课题的结题，而只是其研究成果之一，也是我从事近代史研究近20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的结集。我1981年大学毕业，即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最初是以湘军和湖南地方史作为切入点的，日积月累也做了些许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从事学术工作20年的一个纪念。但愿这本小书，不仅仅是我个人敝帚自珍，也能为湘军和晚清湖南的研究抛砖引玉。

王继平

2001年12月31日



作 者 简 介

王继平，湖南双峰人，1957年生。1981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77级历史专业，1984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1987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历任湘潭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1995年晋升为教授。现任湘潭大学研究生处处长、学位办主任、专门史（中国文化史）硕士点负责人；兼任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全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学位委员会文史评议组召集人、湖南省高校教师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历史学科组成员、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著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纲》、《嬗变与回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和模式研究》、《转换与创造：中国近代文化引论》、《幻灭与新生：戊戌维新与中国法制的现代进程》、《服饰文化学》、《蔡和森思想论稿》（合著）、《湖南近现代史》（合著）、《中国近代史记》（合著）等，在《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

责任编辑：田 文
封面设计：王 华

目 录

自序	(1)
论湘军兴起的社会土壤	(1)
论湘军集团	(16)
略论湘军与近代军阀的关系	(30)
湘军淮军异同论	(42)
论湘军收复新疆的历史贡献	(54)
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	(66)
论湘军与晚清中国社会	(89)
论湘军与晚清湖湘文化	(105)
论近代湘人的湘军情结	(120)
论湘军与晚清湖南社会	(133)
论曾国藩的学术观	(145)
略论曾国藩幕府	(163)
曾国藩左宗棠比较论	(174)

简论樊锥	(190)
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	(202)
近代湖湘学风与湖南人才群体的结构及特质	(214)
近代湖湘新旧文化斗争与湖湘文化的生态环境	(224)
近代湖湘学风简论	(235)
论清代湖南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	(245)
太平军西征在湖南的胜利与挫折	(257)
甲寅四年太平军西征岳州之役	(273)
论太平军西征湘潭之役	(285)
清季湖南教案论略	(296)
近代湘鄂西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308)
近代衡州人民反洋教斗争述论	(322)
湖南官绅与反洋教运动	(335)
论贺金声起义	(348)
论护国战争时期的湘西战场	(360)
护国黔军攻克沅州、麻阳时间考	(374)
禹之谟被捕地点辨正	(377)
后记	(382)

论湘军兴起的社会土壤

湘军，曾被人称为晚清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以为“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①。的确，湘军对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产生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然而，湘军为什么会兴起于湖南？这是饶有兴味的问题，也是为人所忽视的问题。我认为，湘军的兴起，与湖南的社会经济、阶级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之出现在清朝咸丰年间，乃是清中叶以来湖南社会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合适土壤而孕育出来的。

一、中小地主阶级的危机意识

清代湖南的社会经济与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出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若干因素，商业资本的活动在手工业特别是传统的纺织业中有所发现，但从总的趋势来看，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传统农业社会周而复始的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在鸦片战争前后得以充分的表现。这种状况，对湖南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是湘军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清代中叶以来湖南地主经济的发展，是以大地主经济为其特

^① 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

征的，“田之归富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之口，必须买米接济，而富户登场之后，非得善价，不肯轻售，实操粮价低昂之权”^①。在清初“土旷人稀”的情况下，百姓“标产”所占“认纳粮，为永业”的土地，此时基本上转入大地主手中，“弱者以田契送豪家，犹惧其不纳”^②。在鸦片战争前后，湖南“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的大地主亦为不少，甚至还有“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的极富现象。^③

湘军的老巢湘乡县，土地兼并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往往一族数十百家，向之衡宇相望，阡陌相望者，今皆鬻食他人，有其未尽鬻者，特无人鬻者”^④。湘乡县出卖土地的办法，采取“田不分售”的方式，即“原额买入若干亩，售出必如其额。有分买其十之四五者，少间必责全卖，否则坐拼滋讼，甚成命狱。富户既少，原额价多，河清无期，作茧自缚，往往千金之户，负债一二百金，其始不忍以少价出多产，其继债息孳长，减价出田，应者无人。不十年，尽售之，不足偿债”^⑤。这种办法，不仅对自耕农，且对中小地主也是一种十分不利的胁迫。因之，在鸦片战争前，湘乡县呈现出一幅悲凉的景象：“环湘三百里，比户如列眉，庶矣复何加，嗷嗷病饥寒，矧复际歉荒，十室九仞僇，鸿开纪主骨，犹或吮其脂，坐见寓寓民，偏体皆疮痍。”^⑥ 这种景象在湖南

①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

② 王闿运等：《湘潭县志》卷11，第1页。

③ 王闿运等：《桂阳直隶州志》卷20，第25页。

④ 彭洋中：《致邑侯朱石樵明府书》。

⑤ 《湘乡县志》（同治）卷6，“职官”、“名臣”。

⑥ 刘蓉：《养晦堂诗集》第1卷，第8页。

各地大略相同。

土地兼并的发展，使生活无着的贫民大量增加，破产或少地的农民为寻求生活出路，投身营伍，这是湘军兵源的重要方面。

土地兼并的发展，对拥有数量不多田地的中小地主产生了危害。虽然他们并不都沦为佃户或破产失业，但生活却是日见其蹙。曾国藩的家庭，在其高祖曾应贞时代，有价值数千金的产业，但到其祖父曾玉屏手中，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小地主了。其中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恐怕与当时的大土地兼并分不开。在曾国藩为官之前，其祖父、祖母以至曾国藩本人，均承担一定的辅助性劳动。所以曾国藩在对其四弟谈治家之道时说，须“专在作田上用些功夫，以辅之以书、疏、鱼、猪、早、扫、考、宝八字”^①，这反映曾国藩早年的家庭经济状况只是一个中小地主。照朱东安先生的说法，不少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富农的特点，这也是确实的。

湘军的另一个将领左宗棠，其家庭也大致与曾国藩相同。左宗棠幼时，全家共10口人，每年有48石谷的租收入，按每人消费4石计，是不算太富裕的，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地主。^②所以左的父亲左观澜，还要“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③。如果遇上天灾人祸，其生活就更拮据了。所以，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土地兼并的发展，不但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对中小地主也是一种打击。曾国藩曾对这种情况大发感慨说：“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惟家亦然。当其隆时，不劳而坐获；及其替也，忧危拮据，而无少补救，类非人所为者。昔我少时，乡里

① 《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② 梁小进：《左宗棠早期经济状况分析》。

③ 《左文襄公诗文集》卷1。

家给人足，……自远游以来，每归故里，气象一变，田宅易主，生计各蹙，任恤之风日薄。呜！此岂一乡一邑之故哉？”^①

湘军的其他首领如罗泽南、刘蓉、李续宾、王鑫等等，其境况也大致如曾、左。湘军将领在经济上的这种状况，是使他们具有共同思想和政治倾向的原因，正是这种共同点，构成湘军兴起的社会因素。因为中小地主阶级的衰落与困顿，使他们对豪强兼并、官吏腐败的现象也极为不满，希望能恢复和建立封建“盛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面对日益炽烈的农民反抗斗争和起义，他们又深感不安，担心起义会酿成全国性的暴动，危及封建的统治。因此，他们希望寻找一条路，镇压农民起义，挽救封建危机。所谓“君子所自勉者，方大臣际衰乱之世，处昏浊之朝，与庸竖金壬相侪伍，既不忍纲常沦胥，生民涂炭，而思竭吾力以救之，抑不得不贬损丰采，委蛇忍隐以共济”^②。中小地主阶级的这种心态，使其在政治上呈现出双重倾向。

首先，对清王朝，他们是忠心和感恩的。这不仅因为他们与代表地主阶级的清政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且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中小地主得以仕进高官，也是清政府的“恩情相加”的结果，但是，他们又不满意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和豪强兼并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的现象。曾国藩就在早年的奏折中表达了这种不满。他说，民间有三大疾苦：“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申也”^③。他还指出，官场也有四大通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1，“彭母孺夫人墓志铭”，湖南传忠书局版。

② 刘蓉：《养晦堂文集》卷5，“与江岷樵书”。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40—43页。

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①在一首诗中，曾国藩更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景象：“贫者勉自效，富者更可悲。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支，蓐蓐纨袴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菱，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②曾国藩对此表示出强烈的不安，他说：“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③

对农民起义，中小地主阶级深知这是由于官吏的诛求和豪绅的兼并造成的。曾国藩曾说，农民起义，“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④。左宗棠也说：“上失教，故民惑于邪说而会匪以生；上失养，故民迫于饥寒而盗贼以起。此吏治之失于其始也，匪与盗初起之时数健卒缚之而有余，乃丁役则有庇纵之弊，官幕则畏办案之烦，以致族邻恐其株连，忧其报复，则有隐匿之事。甚或正犯巧脱而累及平民……是非颠倒，无所适从……此吏治之失于其中也。”^⑤但是，作为地主阶级中一员，他们并不对农民起义表示同情，充其量不过希望清政府能革除一些弊政，以消弭农民的反抗。至于对已经蜂起的道、咸时期的农民起义，他们坚决主张镇压，以恢复和确立封建统治秩序。

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南中小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这种二重心理结构，正是促使他们在太平天国兴起之时办团练、建湘军的真实心理。因此，湖南的中小地主阶级，乃是湘军兴起的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应诏陈言疏”。

② 《曾文正公全集·诗文》卷1，第2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应诏陈言疏”。

④ 《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⑤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

社会土壤。他们对清政府的期待与不满，对农民起义的不安和反对，使他们在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以挽救天下为己任，起而创湘军以挽救于末世的封建统治，再造“盛世”。

二、经世派的崛起与集聚

湘军的兴起，也是与嘉、道以来湖南学风的熏陶及其影响分不开的。质言之，在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熏陶下的湖南士人群体，构成了湘军官佐的基础。

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滥觞于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在咸丰年间兴盛，左宗棠、曾国藩、刘蓉、罗泽南等人都是经世之学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左宗棠与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都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受他们的影响极大。他认为，“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考特进身之阶耳”^①。所以，他对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研读十分认真，“丹黄殆遍”^②。朝政之腐败，“时务之艰棘”，更使他对“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③。在入幕之前的青年时代，他孜孜于地理学、农学、荒政、盐政、漕政的研求，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大显身手。

与左宗棠的仕途并不相同的曾国藩，也同样具有浓厚的经世之学的学术色彩。曾国藩曾表示他对“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

① 《左文襄公实录》第1册，第11页。

②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1，第1页。

③ 《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第1页。

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①。他主张“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②。他把经世之学看做是与义理、考据同样重要的学问，他还曾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兵制、兵法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进行认真地讲求，以备将来用于治国平天下的事业。

曾、左以外，同时期的其他湖南士子，也大都受经世之学的影响，于国计民生多所讲求，对当时的封建统治危机都表示了对强烈的关注。这些人大都成为以后湘军的将领或与湘军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例如刘蓉、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欧阳兆熊、李续宾兄弟及王鑫等人。这些人大都是互为师友的，与曾国藩也有着学术或朋友的关系。

刘蓉是湘乡人，1834年与曾国藩相识。对于当时汉宋争讼的学风，他与曾国藩有着相同的见解。据云，他曾与曾国藩论学术，对汉宋之学多有所见。他说：“汉人诂经，各有专门，守师说”，而“近世所谓汉学家”，“异论歧出，其说千变”，“然则彼以汉学自鸣，非师古也，师心而已矣。其所为终由之而不厌者，非好学也，好异也已矣”，而“朱子于古今时务政治之宜，靡所不讲，而后世学朱子者，但守心性理气之辩，《太极》、《西铭》之说，闭关独坐，泥塑木雕”^③。刘蓉认为，汉宋之学“混混棼棼，学术坏而人心风欲随之”^④。所以，他提出治学应“匡世济民”，经世致用。

罗泽南在湘军创立之前虽未曾与曾国藩谋面，但二人却“神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4—5页。

② 同上。

③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第44—45页。

④ 同上。